

正時與賦物

——唐代時令賦的物候感知與國家論述

廖 美 玉*

摘 要

四時循環，形構出天地有常的生存空間，孟、荀均以「不違農時」、「無奪農時」為養民富國的先決條件，劉向《說苑》〈臣術〉更以「正四時」為三公九卿的遴選標準之一。唐代科舉以詩賦取士，產生以「時令」名篇之賦作，本文從「正時」與「賦物」兩個視角，探討君臣如何相互制約並宣示敬天授時的治國理念，由貴游到科舉，由中央到地方，由經世到抒情，詩賦創作所關注的對象，乃從人主、名流轉移到百姓，表達內容也從人為的宮室苑囿導引向自然的陰陽順序，藉由祭祀、禮樂等儀制體現皇情帝力，遵循四時變化的自然法則，以「正往曆」、「獻農書」宣示正時務本的施政方針，建立「國富人安」的國家觀念，在「體國經野」、「感時傷逝」的漢賦與抒情傳統之外，可謂別樹一幟。

關鍵詞：時令賦、正時、經濟、物候、國家

一、前 言

人類賴以生存的空間，包括天文與地文，而綰結天文、地文者，厥為四

2015 年 9 月 10 日收稿，2016 年 2 月 2 日修訂完成，2017 年 3 月 6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時循環，從而形構出天地有常的生存空間，《易》〈恒〉乃云：「四時變化而能久成。」¹ 日月星辰依四時而調整運行的軌道，山林川澤與動植物的生息活動，也依自然時序而變化，從而建立和諧、平衡的宇宙秩序。人爲的農業植栽，同樣是配合著四時的週期節奏而播種、萌芽、生長、開花、結實，是以《尚書》〈虞書〉直言「食哉惟時」，²《孟子》〈梁惠王上〉也強調「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³《荀子》〈王制〉更一再陳述「不失時」的重要性：「故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而〈富國〉乃逕以「無奪農時」爲「國富」要件之一。⁴ 因此，劉向（77-6 B.C.）《說苑》〈臣術〉提出三公九卿的遴選標準之一，就在「正四時」、「不失四時」。⁵ 可見自古即已從學理上論定「正時」爲治國的關鍵指標。

有關賦學的主題研究，歷來多著重在言志與詠物上，曹淑娟《漢賦之寫物言志傳統》提出「感士不遇」的言志傳統，⁶ 廖蔚卿〈論中國古典文學的兩大主題——從登樓賦與蕪城賦探討遠望當歸與登樓懷古〉提出「望歸」與「懷古」爲文學史上最具普遍性的兩大人性主題，直言「隋唐以後，這兩種意識情態在各類文體中，爲各代作家用爲主題，已是常見的現象」。⁷ 至於唐賦的研究，馬積高《賦史》論及唐賦超越前人之處，在於諷刺小賦、新文賦、俗賦與律賦，論律賦又重在晚唐的抒情之作，認爲律賦「多爲應試和準備應試（即所謂「私試」）之作，故有價值者不多」。⁸ 簡宗梧、游適宏〈律賦在

1 唐·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頁 84。

2 唐·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本），頁 43。

3 宋·孫奭疏，《孟子注疏》（《十三經注疏》本），頁 12。

4 唐·楊倞注，清·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臺北：世界書局，1971），卷 5〈王制篇第九〉，頁 105；卷 6〈富國篇第十〉，頁 115。

5 漢·劉向，《說苑》〈臣術〉記伊尹之言：「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九卿者，不失四時，通于溝渠，修堤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卷 2，頁 48。

6 曹淑娟，《漢賦之寫物言志傳統》（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頁 203。

7 廖蔚卿，〈論中國古典文學的兩大主題——從登樓賦與蕪城賦探討遠望當歸與登樓懷古〉，《漢魏六朝文學論集》（臺北：大安出版社，1997），頁 96。

8 馬積高，《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 253。

唐代「典律化」之考察》特立「科舉與律賦的典律化」一節，明言「律賦考驗的絕不僅僅是辭藻和聲律的斟酌，而是『穿穴經史』、『驅使六籍』的功夫」；⁹ 趙俊波〈唐代試賦的命題研究——以試賦題目與九經的關係為中心〉，統計現存的試賦題目以出自《禮記》最多；¹⁰ 詹杭倫在《中國文學審美命題研究》中，揭櫫清賦乃繼承唐代恢復科舉試賦制度而「將賦學與經世致用結合起來」；¹¹ 三者都注意到試賦的實用性。¹² 而王士祥《唐代試賦研究》分析唐代試賦的內容特徵有三：反映帝王生活、再現都城文化、歌頌帝德帝功，¹³ 則仍是漢賦的帝王與京城核心觀念。本文擬在前述論述的基礎上，從「正時」與「賦物」兩個視角，探討唐代時令賦的發展脈絡及其意涵，提供唐賦的另一個觀察面向。

二、唐代時令詩賦的經世取向與物候感知

唐代科舉試賦題目以出自《禮記》最多，惟如開元八年（720）李元瓘所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人教業，必事資經遠，則斯道不墜。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¹⁴ 雖推崇九經具有「生人教業」的經濟功能，卻又以為《禮記》乃因「文少」而獲青睞。查《唐語林》、《唐會要》〈制科舉〉均指出開元十九（731）置博學宏詞科，復依孟二冬《登科記考補正》，開元十九年

-
- 9 簡宗梧、游適宏，〈律賦在唐代「典律化」之考察〉，《逢甲人文社會學報》1(2000.11): 1-16。
- 10 趙俊波，〈唐代試賦的命題研究——以試賦題目與九經的關係為中心〉統計現存的試賦題目一共 96 個，出自唐代「九經」有 40 個，又以出自《禮記》的 18 個最多，遠超過其次 7 個的《尚書》。《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8.1(2011.1): 127-131。
- 11 詹杭倫，《中國文學審美命題研究》（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0），頁 207-208。
- 12 吳儀鳳，《賦寫帝國——唐賦創作的文化情境與書寫意涵》第 5 章〈唐代典禮賦創作的文化情境〉雖以月令與五行為唐代典禮賦的關鍵符碼，因強調文士親臨典禮的特質，係以封禪禮為主要論述文本，其月令部分仍可參閱。（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2），頁 143-176。
- 13 王士祥，《唐代試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 6 章。
- 14 唐·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 15〈選舉三〉，頁 355。

的試題即是有關時令的「仲冬時令賦」，¹⁵ 則《禮記》之獲得重視，可從時令詩賦加以理解。

檢視有關實際從事農漁牧經驗的創作，不論是帶有帝王色彩的〈南風〉，¹⁶ 或者農民口吻的《詩經》〈豳風·七月〉等詩歌，¹⁷ 都留下與四時有關的農耕記憶。有識之士彙整民間經驗而成的農書，如近人輯存的漢·汜勝之（生卒年不詳）《汜勝之書》，明白揭示「凡耕之本，在於趣時和土」，以「得時功」可以獲得「一而當五」的豐收保障。¹⁸ 漢·崔寔（103?-170）《四民月令》仿《禮記》〈月令〉而開創出月令體農書，北魏·賈思勰（生卒年不詳）《齊民要素》、梁·宗懷（502?-565）《荊楚歲時記》繼起，建立以時繫事的書寫模式，以天象、物候等有關「農時」的農業技術與活動記載為主，民間性與地方性較為濃厚。直到晚唐韓鄂（生卒年不詳）的《四時纂要》，除了沿襲、增廣先行農書，依四時分爲五卷，其中春令有二卷，夏、秋、冬令各一卷，有關星象、占候者大幅增加，¹⁹ 更以天子百官的起居、祭祀、禮儀等，與民間的擇吉、禳鎮、祭祀等節令活動，形構成四時活動指標。其間的轉折與開拓，唐人時令詩賦提供了重要訊息。尤其唐代以詩賦取士，結合「正時」

15 宋·王謙撰，周勛初校證，《唐語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8，頁 713；清·徐松撰，孟二冬補證，《登科記考補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卷 7，頁 303-305。

16 梁·蕭統編撰，唐·李善注，《昭明文選》（臺北：文化圖書公司，1969），卷 18〈琴賦并序〉題下注引《尸子》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是舜歌也。」（頁 239）魏·王肅編撰，《孔子家語》〈辯樂解第三十五〉云：「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民之財兮。』唯脩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頁 41。

17 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本），頁 280-286。

18 漢·汜勝之撰，石聲漢注，《汜勝之書今釋》（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耕田〉云：「春凍解，地氣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氣始暑，陰氣始盛，土復解。夏至後九十日，晝夜分，天地氣和。以此時耕田，一而當五，名曰膏澤，皆得時功。」引文見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998204>（2015.9.1 上網檢索）。

19 唐·韓鄂撰，繆啟愉校釋，《四時纂要校釋》（北京：農業出版社，1981），統計有關占候、擇吉和禳鎮者居其半，其次有關農業生產者 245 條，包括蔬菜、大田作物與藥用植物等。

的治國論述與出身民間的生活經驗，與「時令」有關的詩賦乃有長足發展。

（一）正道與生人：由貴游到科舉的創作視角

從漢到六朝，賦的貴游屬性濃厚，²⁰ 入唐後詩賦成為唐代用人的重要指標，作者從宮廷貴游到科舉士人的轉變，開啓了專屬於唐人的詩賦格局，使詩／士／仕合體而發揮時用，成了時人關注的議題。王勃（649?-676）〈上吏部裴侍郎啓〉已有「伏見銓擢之次，每以詩賦爲先」之言，攸關「君侯器人」能否進用真正的「高賢」，因而對由漢到唐的詩賦發展有很深刻的反省，著力跳脫枚馬之作的「談人主者，以宮室苑囿爲雄；敘名流者，以沈酗驕奢爲達」，把詩賦創作所關注對象從人主、名流轉移到百姓：

國家應千載之期，恢百王之業，天地靜默，陰陽順序。方欲激揚正道，大庇生人，黜非聖之書，除不稽之論。牧童頓顙，思進皇謀；樵夫拭目，願談王道。……識天人之幽致，明國家之大體，辨焉而不窮，酌焉而不竭，抱膝無悶，盱衡自得。²¹

王勃把詩賦寫作拉到「國家」的高度，以「激揚正道，大庇生人」爲旨趣，表達內容乃從人爲的宮室苑囿導引向自然的陰陽順序，聖賢、牧童與樵夫更是取人主、名流而代之，透過儒家經籍與百姓參與，共同尋繹天人的蘊涵，發明國家的要道，構設出國家永續發展、個人自在幸福的契機。

由此來看開元十九年（731）的試賦〈仲冬時令賦〉，現存有蕭昕（702-791）、張欽敬（生卒年不詳）、叔孫玄觀（生卒年不詳）三篇，大抵從《禮記》〈月令·仲冬之月〉發揮而各有所重。蕭昕所作聚焦在君王的「親帥百辟，觀隙三農、整六軍以耀武，肆大閱于仲冬」，著重在闡發春夏秋三農之隙的大規模閱軍活動，以及「事神率禮，撫俗觀詩」等「王政之禮」，治水、築城、建造宮殿等「土功之務」，²² 大抵因襲漢賦的君王核心觀念。張欽敬所作，仍從「開帝王之洪渚，振皇紀之綱維」發端，惟除聽政受釐等施政禮儀

20 參見簡宗梧，《漢賦源流與價值之商榷》（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簡宗梧，〈六朝世變與貴遊賦的衍變〉，李豐楙主編，《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文學、文化與世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頁19-40。

21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卷180，頁806。

22 簡宗梧主編，《全唐賦》（臺北：里仁書局，2011），頁927。

外，還以「日月惟朗，星辰克正，調歷數之璿衡，叶乾坤之寶命」，闡述《尚書》〈洪範〉的五紀，如孔穎達疏「厯數」所稱：「筭日月行道所歷，計氣朔早晚之數，所以爲一歲之厯。」²³ 精確掌握歲時節候順序，具有正時的意義：

休力役，省征賦。養國中之鰥寡，罷官守之尸素。是使風雨丕順，曾不爽於豐年；霜露以時，諒匪愆於歲暮。²⁴

在政策上與民休養生息、實施冬令救濟，整頓吏治，以人爲的善政使四時、風雨、霜露不失時，以確保豐足的歲收，達到「與義農而比崇」的理想治世，明顯提高正時與生人養民的施政作爲。至於叔孫玄觀所作，乃從天象著手，對四時有較具科學性的分析：「白日貞輝，以著乎運行；素月虧盈，以紀乎孟仲。陰既往而陽受，暑既驟而寒送。」太陽的運行與月亮的盈虧，產生了陰陽寒暑的變化，再進一步說明「正時」的知識來自儀器測量：「景長而土圭可測，氣肅而玉律潛中。若乃搖落既謝，戚戚無惊；霜雪凝凌以戒節，天地閉塞而成冬。」利用土圭觀察、記錄日影移動的變化與規律，可以正確掌握四時月令，以達到「敬授人時」的施政方針：

順物以終，乃安其性。因宜制節，用必克正。使夫有爲而天下御正，無事而天下分定。先王以之狩田，孝子以之溫清。萬人以之休息，群辟以之殷聘。一以明國家之盛，再以誦昭事之令。²⁵

從節令物性上談仲冬的作爲，分別從「有爲」與「無事」兩方面加以闡發，前者在察舉百官、大閱狩田，後者在休養百姓、獎掖孝友。最後對「敗度起功，逆時興務；重其徭役，急彼征賦。動衆不隨其物宜，馭人不以其寬裕」進行反思，指出違反時令將招致災異癘疾，而歸結於「時令之可懼」。循此發展，成書於開元二十六年（738）的《唐六典》，載明「凡進士先帖經，然後試雜文及策，文取華實兼舉，策須義理愜當者爲通。」²⁶ 高宗永隆二年（681）〈條流明經進士詔〉、玄宗〈條制考試明經進士詔〉所列「雜文」均含詩賦，

23 分見簡宗梧主編，《全唐賦》，頁 1391；孔穎達等，《尚書正義》，卷 12，頁 171。

24 簡宗梧主編，《全唐賦》，頁 1391-1392。

25 同上註，頁 1611-1612。

26 舊題唐玄宗撰，李林甫等注，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 4，頁 109。

且以「識文律」、「華實兼舉」、「義理愜當」爲要。²⁷天寶末進士盧綸（737?-799），及第前作〈與從弟瑾同下第後出關言別〉，有「同作金門獻賦人」之語，²⁸可見作賦已成爲應試者的基本功課。

科舉試賦固然引導士人「可以爲大夫」²⁹的思考方向，如王勃所提出的「激揚正道，大庇生人」創作理念，與時令試賦所闡發的正時、順利、安性與養民觀念，畢竟曲高而偶一見之，安史亂後所檢討的科舉試詩賦弊端，如劉嶢〈取士先德行而後才藝疏〉（上元元年，760）、楊綰〈條奏貢舉疏〉（寶應二年，763）、趙匡〈舉選議〉（大曆年間，766-779）即深切指出：

國家以禮部爲孝秀之門，考文章於甲乙，故天下回應，驅馳於才藝，不務於德行。……況古之作文，必諧〈風〉、〈雅〉，今之末學，不近典謨。勞心於草木之間，極筆於煙雲之際，以此成俗，斯大謬也。³⁰

至高宗朝……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從此積弊，浸而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掛壁。況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³¹進士者，時共貴之。主司褒貶，實在詩賦，務求巧麗，以此爲賢。不惟無益於用，實亦妨其正習；不惟撓其淳和，實又長其佻薄。³²

綜合當時的憂心，主要在於詩賦取士所引導的學習風氣，聖人著作的六經三史被束之高閣，閱讀層面大幅限縮在有影響力的當代數家，且流於才藝技巧的精巧工麗，「天人之幽致」只剩下草木煙雲的精心摹寫，應試者「不近典謨」、「無益於用」的結果，攸關國家大體的皇謀、王道既少人講究，安史之亂的暴發也就顯現出人才危機。因此，杜佑（735-812）《通典》〈選舉六〉乃提出「文詞取士，是審才之末者」的總結，³³而有沈既濟（750?-797）、鄭覃（？

27 唐高宗，〈條流明經進士詔〉，宋·宋敏求，《唐大詔令集》（上海：學林出版社，1992），卷 106，頁 502；〈條制考試明經進士詔〉，董誥等編，《全唐文》，卷 31，頁 146。

28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9），卷 276，頁 3131。

29 漢·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3），卷 30〈藝文志〉，頁 1755。

30 唐·劉嶢，〈取士先德行而後才藝疏〉，董誥等編，《全唐文》，卷 433，頁 1958。

31 唐·楊綰，〈條奏貢舉疏〉，董誥等編，《全唐文》，卷 331，頁 1484。

32 唐·趙匡，〈舉選議〉，董誥等編，《全唐文》，卷 355，頁 1593。

33 唐·杜佑，《通典》，卷 18〈選舉六·雜議論下〉，頁 456。

-842)、李德裕(787-850)等人先後上疏罷試詩賦、停進士科。³⁴ 檢討詩賦取士的聲浪既高，也因而促成唐人作賦的扣合典謨，如清·李調元(1734-1803)《賦話》所稱：「唐人體物最工，么麼小題，卻能穿穴經史……宋以後諸公所不能及。」³⁵ 從經史所得的體物工夫，自然精妙。清·汪廷珍(1757-1827)《作賦例言》即從閱讀的角度提出：

要緊工夫全在讀子史經集，講人情物理，以明義理、廣見聞，方得進步。若貪取舊賦舊文，多收熟讀，不免枉費精神，且滿腔渣滓，久則心源閉塞，不可救藥。欲通文理，固屬斷港絕潢；以問功名，尤是南轅北轍。³⁶

作詩賦的工夫不在讀舊賦舊文，而在經史典謨的涵泳，以及人情物理、義理見聞的講究。至於如何恢復能賦「可以爲大夫」的初衷？與天文、農耕與食物有關的時令詩賦，即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察點。

(二) 敬天與順時：由抒情到經世的時令書寫

唐代時令賦對物候的感知，部分仍延續漢魏以來感時傷物的抒情書寫，³⁷ 如初唐虞世南(558-638)〈秋賦〉是文學性的登臨遠望之作，著重在「登綺閣，臨飛觀」、「燕違幕而巢空，雁驚群而行絕」、「蓮尚香於江浦，草猶青於河畔」的物候遷移；³⁸ 李白(701-762)〈惜餘春賦〉、〈愁陽春賦〉、〈悲清秋賦〉也都還是「登高而望遠」的抒情之作。³⁹ 值得注意的是應制應詔之作，呼應治國方針而更多關注到「時令」的經濟意義，如許敬宗(592-672)〈麥秋賦應詔〉已能著眼於農作物的生長，首先就分析宿麥的物種特性，云：

五土異宜，四氣分序。考宿麥於生類，起嚴秋於溽暑，扇漸秀於梅風，潤岐苗於穀雨。

34 宋·歐陽脩、宋祁，《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5)，卷44、45〈選舉志〉。

35 清·李調元，《賦話》(臺北：廣文書局，1971)，卷4，頁90。

36 王冠輯，《賦話廣聚》(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第3冊，頁350。

37 鄭毓瑜，〈身體時氣感與漢魏「抒情」詩——漢魏文學與楚辭、月令的關係〉，結合月令體系的時節知識與《楚辭》「悲秋」系列的於邑纏結，闡發漢魏「感(時、節)物」文學的抒情特質。《漢學研究》22.2(2004.12): 1-34。

38 簡宗梧主編，《全唐賦》，頁60。

39 同上註，頁875、878。

宿麥是因應特殊氣候的補救性植栽，⁴⁰ 在秋天播種，早春開始醞釀吐穗開花，晚春的豐沛雨量適時促成植栽的茂盛。許敬宗從秋冬到春天的物候現象，發揚宿麥的成長特性，鼓勵增加一季的農業生產：

於時陽翹總暢，陰呂潛生。當隆曦之首節，韞秋令之初萌。雜芸黃於綠野，參肅殺於朱明。始自天而下降，終因地而斯成。疇中氣爽，壟際風清。……葉幄垂秀，條帷汎光。鶯傳枝而嫵娜，蜂散蕊而芬芳。對銀縞而偶綫，並金縷而分芒。⁴¹

時序剛入秋，陰陽、晴雨、黃綠並行互見，掌握某些區域性的氣爽風清，播植特殊物種的宿麥，在春天短暫的開花期，藉著鶯鳥與蜜蜂的傳播花粉，即可預期良好的收成，有效改善民生經濟。李邕（678-747）〈春賦〉更直接從政策面講究時令的重要性：「於是明詔有司，攄求時令，邁惟一之德，究吹萬之性，剿土木之庶功，阜稼穡之勤政，畋漁止殺，狴牢復命。」⁴² 能掌握春季時令，猶如風吹萬竅般呈顯出蓬勃的自然生意，而人爲的配合措施，包括土木建造、耕耘稼穡的勞作，對狩獵畋漁的克制，尤以細膩摹寫蟄戶、蛇盤、燕伏、穴蟻、冰魚的蠢蠢戢戢，更舉《詩》之〈甫田〉、〈豳風〉與開田種瓜說明耕植工作，雖不免導入思婦、老軍與公侯春臺游觀等抒情傳統，仍可見較多的摹寫物候與民生的時令書寫。由此，時令與政策的結合乃成風尚，如陳正卿（?-762）〈望雲物賦〉：

維人有令，維天有兆……授時莫愆，行令靡爽……節候應乎寒燠，政令隨乎慘舒。⁴³

結合天文與人文，在政策上嚴格遵守授時行令的治國方針，呼應著節候寒燠的變化而調整政令。貞元（785-805）時，韋縝（?-838?）〈讀春令賦〉追溯朝廷春令的歷時性發展：「漢王修之以展禮，晉后奉之以施敬。伊歷載之或虧，洎我唐之斯盛」，從漢至晉，君王以奉行時令展現對自然的崇尚，隨著時

40 《漢書》記載：「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顏師古注：「秋冬種之，經歲乃熟，故云宿麥。」漢·班固，《漢書》，卷6〈武帝紀〉，頁177。

41 簡宗梧主編，《全唐賦》，頁115。

42 同上註，頁501。

43 同上註，頁1197。

異世遷，〈月令〉不行，⁴⁴漸漸失掉了敬天順時的精神，唐代乃著意恢復時令禮儀，並以「春令」為例發揚其意涵：

若夫太昊統節，勾芒御辰。歷以元而天地更始，氣直震而物候惟新。皇上乃順時令，序彝倫。載青旗之容與，服蒼玉之璘玕。辨色而金貂列位，迎春而玉輅回輪。爰奉令以進讀，遂授時而發春。俯僂前止，精誠上陳。曉色分於丹陛，韶華發於紫宸。遂煥爵以頒秩，乃布德而昭仁。……穆穆秘殿，明明我皇。體乾道以從事，閱〈春令〉而頒方。可謂君奉時而罔失，臣出言而有章。時歷克正，憲度克揚。⁴⁵

四時循環，一元更始，東方之神太昊、春神勾芒開啓了「物候惟新」的生機，人間帝王以「順時令，序彝倫」呼應春意，親自執行載青旗、服蒼玉的迎春儀式，更在朝廷上展演讀春令、授農時的君臣互動模式，宣示順應天時的行事原則，使「時歷」與「憲度」並置成為國家的憲令法度。因此，柳宗元（773-819）〈時令論上〉雖然對政令與時令的關係另有一番見解，⁴⁶仍明白揭示〈月令〉為聖人之作：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措諸《禮》以為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為之備，聖人之作也。⁴⁷

有關月令的專篇，先後收錄在《呂氏春秋》〈十二紀〉、《淮南子》〈時則訓〉及《禮記》〈月令〉中，逐月記載天文與政令，文字略有出入，大抵為古聖先賢觀察太陽運行、四時變化與萬物消長的經驗累積。柳宗元進一步把「俟時而行」的作為細分成朝廷與百工，以修封疆、相土宜、利堤防、達溝瀆、止

44 如柳宗元〈時令論下〉所云：「或者曰：月令之所作，以為君人者法也。蓋非為聰明睿智者為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而肆於人上，忽先王之典，舉而廢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於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董誥等編，《全唐文》，卷 582，頁 2604。

45 簡宗梧主編，《全唐賦》，頁 1361-1362。

46 柳宗元明確分辨：「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認為布德和令、遂賢良、選士勵兵、來商旅等，不必俟時而行之，明指「反時令」以致禱禳、厭勝、鬼怪等災異，乃屬「瞽史之語」，不足為法。董誥等編，《全唐文》，卷 582，頁 2604。

47 同上註。

田獵、郊廟百祀等為朝廷之事，以「季春合牛馬」、「仲秋……種麥」、「季秋……趨人收斂，務蓄菜，伐薪為炭」等為百工之事，即「所謂敬授人時者也」。⁴⁸可見時令的關鍵在於經濟，漢代展現君權的畋獵主題，取而代之的是以「止田獵」體現自我權力的克制，以郊廟百祀展演出敬天的儀式，更重要的是修封疆、相土宜、利堤防、達溝瀆等積極作為，為農業生產提供了良好的公共設施，再依四時輔導百工努力增產、儲蓄，自然就能確保民生日用的充足。是以中晚唐科舉試題或因應考試的擬題之作，頗多關涉律曆時令者，如王起（760-847）〈東郊迎春賦〉、〈北郊迎冬賦〉、〈開冰賦〉、〈蟄蟲始振賦〉均出自《禮記》〈月令〉，趙俊波《中晚唐賦分體研究》即指出：「王起之作……以寫朝廷禮儀制度、政教法令以及律曆內容為主，其題以出自經史之書為多。這正符合于應試之作的要求。」⁴⁹可證韋縝所云「洎我唐之斯盛」的復興景況。又如鄭谷（849-911）〈咸通十四年府試木向榮（題中用韻）〉詩云：

園林青氣動，眾木散寒聲。敗葉牆陰在，滋條雪後榮。欣欣春令早，藹藹日華輕。庾嶺梅先覺，隋堤柳暗驚。山川應物候，泉壤起農情。只待花開日，連接出谷鶯。⁵⁰

「木向榮」雖非出自經史，陶淵明〈歸去來兮辭〉的「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⁵¹恰是春耕氣象，是以鄭谷寫出由冬轉春的欣欣生意，即由早春的梅花、柳樹等山川物候，導引出春令與農情。

（三）應制與賦物：由中央到地方的時令情境

春暖花開，物色鮮妍，自古即多春游賞景之作，而肩負治國大任的君臣，乃不斷藉由應制與唱和，相互制約並宣示敬天授時的施政方針，如王維（701-761）〈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所彰顯「為乘陽氣行時令，不是宸遊玩物華」的君心，⁵²而竇牟（749-822）〈元日喜聞大禮寄上翰林四學士中書六舍人二十韻〉的「有事郊壇畢，無私日月臨。

48 同上註。

49 趙俊波，《中晚唐賦分體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頁312。

50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675，頁7725。

51 晉·陶潛撰，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臺北：里仁書局，1980），卷5，頁161。

52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128，頁1295。

歲華春更早，天瑞雪猶深。玉輦迴時令，金門降德音。」⁵³更以君王郊祭的儀式，在下雪的日子宣告春臨大地。應試之作如敬括（？-771）〈省試七月流火〉的「禮標時令爽，詩興國風幽。自此觀邦正，深知王業休」，⁵⁴回歸《詩》、《禮》典謨，以美政取代悲秋。此外，潘孟陽（？-815）〈元日和布澤〉的「恩洽因時令，風和比化原」，⁵⁵于尹躬（？-811）〈南至日太史登臺書雲物〉的「至日行時令，登臺約禮文。……惠愛周微物，生靈荷聖君」等，⁵⁶都說明行時令為朝廷施政的重要指標。至於皇甫曾〈送王相公赴幽州〉的「人安布時令，地遠答君恩」，⁵⁷則是時令推廣至地方的成效。

值得一提的，唐詩中有關官員的執行春令宣導，結合物候與勸農而時見抒情、賦物之作，如張九齡（678-740）〈巡屬縣道中作〉的「春令夙所奉，駕言遵此行」，勸農之餘，遂興發「山藪情」而有「退耕」之思。⁵⁸又如包佶（？-792）〈祀風師樂章·送神〉詩云：「氣和草木發萌芽，德暢禽魚遂翔泳。永望翠蓋逐流雲，自茲率土調春令。」⁵⁹本屬祭祀禮樂的郊廟歌辭，以草木萌芽、禽魚翔泳的賦物瀏亮，使春令的宣導活動顯得生意盎然。至如錢起（？-780?）〈奉和張荊州巡農晚望〉云：

太清霽雲雷，陽春陶物象。明牧行春令，仁風助昇長。時和俗勤業，播殖農厥壤。陰陰桑陌連，漠漠水田廣。郡中忽無事，方外還獨往。日暮駐歸軒，湖山有佳賞。宣城傳逸韻，千載誰此響。⁶⁰

地方官員的仁政，就在掌握雲雷作之後的物象昇長，依時行春令、勸農耕，以勤奮播殖營造出大片桑陌水田的田園風光。處在風調雨順、物候清明的自然環境中，回歸孟、荀所強調的「不違農時」、「無奪農時」，錢起體會到地方施政就在不擾民的「無事」，百姓能夠安居樂業，自然就「民有餘食」而「國

53 同上註，卷 271，頁 3037。

54 同上註，卷 215，頁 2250。

55 同上註，卷 330，頁 3689。

56 同上註，卷 305，頁 3473。

57 同上註，卷 210，頁 2185。

58 同上註，卷 47，頁 574。

59 同上註，卷 205，頁 2138。

60 同上註，卷 236，頁 2615。

富」，而士人經世濟民的理想，乃得與友方外、賞湖山的詩意生活相結合。更以謝朓（464-499）出任宣城太守的「既歡懷祿情，復協滄州趣」（〈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為典型，既有〈賦貧民田〉之二的善體民情，寫出「察壤見泉脈，覘星視農正。黍稷緣高殖，稱稌即卑盛。舊埽新塍分，青苗白水映。」以豐富的天文、地理與植物等知識，協助農民興修水利，掌握農時，分辨植栽的生長特性，增加可耕地，農作物成長良好，自然就能擁有如〈游東田〉的「遠樹暖阡阡，生煙紛漠漠。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⁶¹跳脫地方官員的格局，以別具深情妙理的山水佳作，同時達到兼善與獨善的生命境界，成為唐人一再吟詠的仕宦典範。來自東南邊陲的閩人歐陽詹（755-800），因「旅遊于利，睹人安俗阜，欽所以美」，寫下〈益昌行并序〉，對於良牧為政五年所達到的美政，以詩描繪出地方治理的典範：

驅馬至益昌，倍驚風俗和。耕夫隴上謠，負者途中歌。處處川復原，重重山與河。人煙遍餘田，時稼無閒坡。問業一何修，太守德化加。問身一何安，太守恩懷多。賢哉我太守，在古無以過。愛人甚愛身，治郡如治家。雲雷既奮騰，草木遂萌芽。乃知良二千，德足為國華。今時固精求，漢帝非徒嗟。四海有青春，眾植佇揚葩。期當作說霖，天下同滂沱。⁶²

把百姓安居樂業、物阜民豐的幸福偏鄉，歸美於太守的以愛治郡，特別標舉出「人煙遍餘田，時稼無閒坡」、「雲雷既奮騰，草木遂萌芽」、「四海有青春，眾植佇揚葩」，具體回應孟子的「不違農時」與荀子的「不失時」、「無奪農時」等生民富國的論述。整體而言，以漢比唐固然是常見的手法，更細緻地探究唐人如何自覺到不同於漢之處，特別是回歸自然星象與四時的變化，在君王貴游之外，把人民寫入詩賦的版圖，嘗試以「蒼生」一詞檢索遂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僅得 7 筆，⁶³《全唐詩》中則多達 157 筆，⁶⁴《全宋詩》

61 遂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3〈謝朓〉，頁 1429、1434、1425。

62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 349，頁 3901。

63 檢索自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2015.9.1 上網檢索）。

64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有 150 筆；陳尚君輯校，《全唐詩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有 7 筆。同上註。

又降爲 41 筆，舉唐詩中與農時物候有關者，如杜甫（712-770）〈九日寄岑參〉的「吁嗟呼蒼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司空曙（720-790）〈御製雨後出城觀覽敕朝臣已下屬和〉的「因知聖主念，得遂老農情。隴麥垂秋合，郊塵得雨清。時新薦玄祖，歲足富蒼生」，李德裕〈寒食日三殿侍宴奉進詩一首〉的「赤縣陽和布，蒼生雨露膏。野平惟有麥，田闢久無蒿」等，⁶⁵ 亦可見回歸敬天順時與農業生產的百姓主體，應是唐代詩賦得以超越前人的關鍵之一。

三、由體國經野到國富人安：時令賦所開啓的國家論述

就國家治理而言，《尚書》〈堯典〉記載堯命羲和爲掌天地四時之官，明訂「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⁶⁶ 著重對自然法則的詮解與遵循；〈大禹謨〉從主政者的角度，提出「德惟善政，政在養民」，⁶⁷ 使敬授人時與養民成爲治理天下之要務。而《周禮》〈天官冢宰〉則提出「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⁶⁸ 建國之道已由遵循自然轉而爲管理土地，著重在對土地的精密計算與經營，做爲「可與圖事」、「朝夕論思，日月獻納」的賦家，⁶⁹ 「體國經野」自然成爲漢賦的重要主題。而延續秦始皇的「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⁷⁰ 以宮殿建設作爲統治權

65 以上引詩見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 216，頁 2258-2259；卷 293，頁 3336-3337；卷 475，頁 5388。

66 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頁 21。

67 同上註，頁 53。

68 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十三經注疏》本），卷 1，頁 10-11。

69 漢·班固，《漢書》〈藝文志〉詮釋「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云：「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卷 30，頁 1755）又〈兩都賦·序〉亦指出：「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卷 24〈全後漢文〉，頁 602。

70 漢·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臺北：鼎文書局，1983），卷 6，頁 239。

的宣示，司馬相如〈天子游獵賦〉也以「諸侯納貢」、「封疆畫界」標示國家的主權。因此，在賦的選題上乃如劉勰《文心雕龍》〈詮賦第八〉所云：「夫京殿苑獵，述行序志，并體國經野，義尚光大。」⁷¹ 國家統治權的議題成了漢賦的主流。鄭毓瑜〈歸反的回音——地理論述與家國想像〉即指出「漢代『苑囿』一類大賦，是最能維護與宣揚帝王與帝國權力的地理論述。」尤著力闡發西漢末興起的「行旅賦」：

不論是劉歆、班彪、蔡邕所成就的「歷史—地理」意識，或潘岳、謝靈運所建構的「地理—風物（山水）」意識，在在都可以看到藉由國家領域或宗族傳統乃至於苑囿規模所進行的種種認同或者是抗拒的創發性的反思。⁷²

由漢到晉宋，「地理」成為賦家所關注的焦點，賦所構設的國／家觀念與傳承，就建立在對土地的擁有、開闢、建設與賞玩上，相形之下，以日月星辰的運行與四時變化為關注點的「天文」，就成為國家專責單位的權限。唐朝的治國方針朝向富民政策發展，吳兢《貞觀政要》〈務農第三十〉記載唐太宗深知「安人寧國，惟在於君」的道理，其養民思想乃「常欲賜天下之人皆使富貴」，明白指示朝臣：「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使人民「恣其耕稼」即可達到天下之人皆富，並主動提出「不從畋獵」的自我約束。⁷³ 因應科舉取士而興的唐賦，乃重新找回對「天文」的感知，從陰陽寒暑與四季變換中體現生存處境，連結「時」與「食」而攸關國富人安的農業生產，展現對自然的謙卑與禮敬，尤其中唐氣候變遷所導致的寒燠異常現象，⁷⁴ 忍受寒燠與珍惜四時美景，是人類最要學習的課題，促成了唐代時令賦的豐富意涵。

（一）正時授人的重要性及儀式意義

中唐的氣候異常現象，依《新唐書》〈五行志〉記載：「貞元元年正月戊

71 梁·劉勰撰，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84），頁137-138。

72 鄭毓瑜，〈歸反的回音——地理論述與家國想像〉，《性別與家國——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臺北：里仁書局，2000），頁128-129。

73 唐·吳兢，《貞觀政要》（臺北：宏業書局，1980），卷8〈務農第三十〉，頁369-372。

74 廖美玉，〈韓白對中唐寒燠異常的感知與書寫〉，《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50.5(2013.9): 6-14。《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12(2013.12): 87-96，全文轉載。

戌，大風雪，寒；丙午，又大風雪，寒，民饑，多凍死者。十二年十二月，大雪甚寒，竹柏柿樹多死。」⁷⁵ 因嚴寒導致「竹柏柿樹多死」的嚴重農損，傳統曆法已無法反映實際物候，如何更精確地掌握時令變化，頒布適合時用的曆法，提供正確的時節變化資訊，以確保良好的歲收，成了重要的課題。貞元十六年（800）進士陳昌言（生卒年不詳）〈先王正時令賦〉開章即說明「正時」之重要：

天序運氣，王統時紀。欽若是授人之初，履端為步曆之始。欲正時而罔忒，非置閏其何以。⁷⁶

帝王具體實踐「授人以時」的方式，乃由專人觀察自然運行而訂曆法，再頒布施行，成為百姓從事農耕漁獵等生產活動的依據。而當曆法與實際天象節候出現落差時，及時編造新曆乃成了國家大事。唐代除了開國之初延用隋朝的大業曆，共計編造頒布七部曆法，其中有五部是在貞元之前頒布的，⁷⁷ 曆法理論與技術已有長足進步，如開元年間一行（683-727）等人編造的大衍曆，除了大規模觀測星象，還考慮了季節變化的影響，更能滿足民用需求。⁷⁸ 因此，陳昌言在賦中宣揚「我唐百王居盛，九葉伊聖，昧爽無忘乎順序，動息必繇乎時令。」把時令與順序做了最緊密的結合，並以作賦的季節為例，展現出仲秋物候知識：

於時金風半肅，雕雲乍斂。野樹丹舒，遙峰翠點。燕溟海以馳歸，鴻朔漠而方漸。⁷⁹

完全不同於《楚辭》系統以感遇悲秋為主軸的抒情書寫，陳昌言極力摹寫季

75 歐陽脩、宋祁，《新唐書》，卷 36，頁 936。

76 簡宗梧主編，《全唐賦》，頁 2047。

77 高祖武德二年（619）頒用戊寅元曆，高宗麟德二年（655）頒用麟德曆，玄宗開元十七年（729）頒用大衍曆，代宗寶應元年（762）頒用五紀曆，建中四年（783）頒用正元曆，穆宗長慶元年（821）頒用宣明曆，昭宗景福二年（893）頒用崇玄曆。

78 歐陽脩、宋祁，《新唐書》〈天文志·曆三下〉：「凡陰陽往來，皆馴積而變。日南至，其行最急，急而漸損，至春分及中而後遲。迨日北至，其行最舒，而漸益之，以至秋分又及中而後益急。急極而寒若，舒極而燠若，及中而雨暘之氣交，自然之數也。」（卷 27 下，頁 621）

79 簡宗梧主編，《全唐賦》，頁 2048。

節性的物色：以風行雲捲描繪出秋高氣爽的景象，丹翠交織成絢爛的秋色，不同生態的候鳥也各自逐陽而去。擺在時令的大宇宙中，屬於仲秋的天空、大地與動植物，在經歷過春夏的滋潤與生長之後，是四時循環中的最高點與轉折點，展現出冬季來臨前的活躍與應變。唐人對曆法的重視，闕名的〈聖人以四時爲柄賦〉有更完整的論述：

粵若受天明命，配天啟聖。其作則也，必敬敷五教，齊七政。節春夏秋冬之候，順金木水火土之性。變通無失，表正度以爲平；雩祀有常，示帝圖之斯盛。⁸⁰

國家施政，除了人倫的五常之教與日月五星的七政，還包括春夏秋冬的四時節候與金木水火土的五行特性，在運作上固然要能夠隨時變通，而有國者的治理就展現在「雩祀」的儀式性宣示上。接著依序闡明春季「念群生而悉遂」的萌發，夏季「體長嬴之所以」而長卉木，秋季「有湛露兮斯降，涼風兮斯至」的凋落，冬季「有積雪兮自爾，有堅冰兮自茲」的歲寒，而執政者的作爲，就在「執陰陽代謝之功，咸歸不宰；用日月推遷之候，盡合無爲。」以確保「衣褐」者的衣食無虞。對於朝議有關應試詩賦「不近典謨」、「無益於用」的指摘，特別在篇末指明「故尋繹於《禮》經，因抽毫而是賦」的創作旨趣，⁸¹有爲詩賦取士辯解與導正的意味。

時令賦所發揮的《禮》經，主要是《禮記》〈月令〉，且聚焦在耕種與收成的春、秋兩季，由天子親自舉行國家級的祭祀儀式，宣示敬天授人的施政方針，如《禮記》〈月令〉所云：

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⁸²

難即儺，藉由天子親自主持的儀式，展現與自然互動的誠意，包括立春的東郊迎春，季春的畢春氣，仲秋的達秋氣，使節氣更到位，爲農作物提供更良

80 同上註，頁 5233。

81 同上註，頁 5234。

82 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本），卷 14 〈月令第六〉，頁 286；卷 16 〈月令〉，頁 326。

好的成長與結實環境。代宗（726-779）時進士孫頴（生卒年不詳）〈春儺賦〉一再陳述儺的目的乃「令陰氣以下降，使陽和而上利」、「將以窒陰氣，發陽和」、「抑陰而畢春」，以人爲的方式促使春天如期到來。賦中描摹卒歲之儺的裝扮與儀式爲「丹首纓裳，辮髮文身。撝金鼓以騰躍，執戈矛以逡巡」，教戰的意味較爲濃厚，相形之下，春儺的「騰金耀於四目，被熊皮於五色。乍煒煒以煌煌，或眙眙而赳赳。既秉戈而揚盾，率百隸而是職」、「玉以制容，金以飾途。流聲教以布濩，乃洋溢於天衢」，就顯得光輝而耀眼，因而歸結於「陰陽交和，庶物時育。氛氲將掃，祥光可掬」，⁸³ 在春光洋溢中綻放欣欣生意。

爲了確保春天的如期到來，除了儺，還有鞭土牛的儀式。依曆法，天地萬物的復始與更新就在「立春」這一天，常惟堅（生卒年不詳）〈立春出土牛賦〉捕捉到由冬寒向春暖轉化的境況：「其候凜冽，其氣清英。條歲陰之將盡，復陽春之載萌。知北陸之寒光尙斂，喜東郊之暖氣先迎。」在歲陰與陽春交替之際，節候變化還未脫離寒冬的凜冽，大地已瀰漫春天特有的清英氣息，及時迎接春天的暖氣，就成了朝廷的首要任務，因而有「裂金犬以取諸助氣，策土牛以示乃發生」、「將協地紀，克符天秩」的人爲催助儀式，以利進行「候農祥而取正，引丁壯而就功」、「正我耒耜，務我耕鑿」、「惟穀是登，惟人是恤」的農業生產工作，能夠「惟利是持，惟時是授」，給合天時、物性與政令，做到「物各遂其性，農不奪其時」，就可達成「人和而年豐」乃至「家給而人足」、「兵強而國富」⁸⁴ 的太平治世。

再以〈東郊迎春賦〉爲例，現存三篇，一是貞元十四年（798）進士王起，一是貞元十九年（803）進士賈餗（？-835），一是開成二年（837）進士謝觀（？-865），大抵包含儀式緣起、盛況與物候摹寫三部分，而各有側重。有關儀式緣起，王起提出「將欽承上帝，而敬授於下人者也」、「展聖容之穆穆，引天步之遲遲」，⁸⁵ 從意涵上凸顯天人之間的互動；賈餗的「崇五帝之經教，酌三代之典禮」，⁸⁶ 與謝觀的「遵古典以立則，授人時而敬用」，⁸⁷ 乃從

83 簡宗梧主編，《全唐賦》，頁 1947-1948。

84 同上註，頁 4925。

85 同上註，頁 2949。

86 同上註，頁 3640。

87 同上註，頁 3854。

遵循古禮上說。有關迎春盛禮的摹寫，王起著力於臣民的參與：「百辟陪乘，千官扈蹕」、「俎豆莘莘而駭目，衣冠楚楚而鞠躬」、「都人士女，候彩仗以駿奔；文物聲明，擁彩華而鱗集」，⁸⁸ 呈現出君民同歡的豪華景象。而賈餗與謝觀都只寫到官員的參與：「千官萬騎，拱神位於中霄」與「萬騎而前分儀仗，千乘而後列公侯」，⁸⁹ 特別標舉春天第一個曉日，賈餗尚以「拜之於曉，有類乎拜日之朝」帶過，⁹⁰ 謝觀更細筆摹寫出曉日與儀式的意義：

俄而斗轉招搖，日當甲乙。褫元冕於殘漏，掛青衣於曉律。翠華忽舉，見閭闔之初開；蒼龍啟行，與朝陽而對出……帝乃玉色以進，磬折而前。求發生之候不忒，祈溫和之氣罔愆。盡敬於地，冀佑於天。一拜而北陸之寒去矣，再拜而東方之風煦然。⁹¹

帝王以至高的誠意，對著春天的第一個曉日，祈求「發生之候不忒」、「溫和之氣罔愆」，希望藉由虔誠的禮拜，送走嚴寒的冬雪而迎來溫煦的春風，對照史書的記載，中唐氣候變化頗為劇烈，暴雪嚴寒的冬天有拉長的現象，⁹² 可以理解謝觀在賦中描述儀式的慎重其事。至於物候的摹寫，王起的「草木之萌，必因茲而動矣；原野之蟄，亦自此而啓之。」⁹³ 只是一般的物候知識；賈餗的「寒色尚留於壇墀，淑氣已生乎杳冥」、「日月克符於躔次，草木遂生於原隰。施惠而穀雨垂恩，發號而春雷起蟄。」⁹⁴ 已能感受到氣候寒化的傾向，因而有較多的預後期許。至於謝觀則只停留在儀式的形容，春天彷彿成了君臣在拜禱之後的等待。

現存有關時令儀式的唐賦，主要集中在攸關農耕的春季，以夏、秋、冬為主題的各有一篇。貞元四年（788）進士崔立之（生卒年不詳）〈南至郊壇有司書雲物賦〉詳細刻劃夏日儀式的進行：「於是乘法駕，鳴和鸞。玉漏聲曉，金波影殘。環衛儼以星拱，簪裾列而雲攢。備肅肅之盛禮，咸濟濟於靈壇。」

88 同上註，頁 2949。

89 同上註，頁 3640、3853。

90 同上註，頁 3640。

91 同上註，頁 3853。

92 廖美玉，〈韓白對中唐寒燠異常的感知與書寫〉，《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50.5（2013.9）：6-14。

93 簡宗梧主編，《全唐賦》，頁 2949。

94 同上註，頁 3639-3640。

大呂〈雲門〉，既六變而斯闋；嘉栗旨酒，感百神而具歡。」⁹⁵ 夏季是動植物成長的季節，以盛大的排場、樂舞與供品來娛神，特別強調「祈動植之攸濟，匪娛樂而是甘」的非娛樂性，發揚「宇宙氛氲，晴郊景曛」、「既豐稔之足徵，復災厲之何有」的生產作為，以適合動植物成長的氣候，獲得「時和俗阜」的富足歲月。⁹⁶ 秋天屬於收成的季節，天氣的好壞攸關收成，惟依貞元五年（789）進士馬逢（生卒年不詳）〈西郊迎秋賦〉，儀式描述之外，與農業生產有關的只有「天地始肅，秋冬將布。勞我農夫，張我王度」，反而著重在刑罰、軍防與外賓等展現國威的作為。⁹⁷ 至於王起〈北郊迎冬賦〉，遵循古禮的意味濃厚：「考時訓而咸若，稽〈月令〉而畢賦」、「佐天而成功」，完成了「法天之序，立人之程」的歲時程序，「於時時和歲豐，勞農息力」，⁹⁸ 以休息等待來年的時令循環。

整體而言，在與自然物候息息相關的農業時代，「正時授人」是確保國富民安的不二法門，國家的運作也都依時令來進行，如王起的〈開冰賦〉所云：「國家順仲春之律，開藏冰之室。」⁹⁹ 國家儀式的宣示性意義，再加上時令習俗的強化作用，如闕名〈春賦〉所云：「若乃三朝三元，時惟正始，進椒花以獻壽，酌白獸以言事。設五木之湯，列五辛之味」、「畫雞葦索以皆陳，柏酒桃湯而具備。放邯鄲之鳩，獻雕胡之米。或懸羊而磔雞，或獻琮而執贄。斯謂上日，四時肇啓。至其元日命社，以祈農祥」、「亦以封土達氣，報本反始，或爲群姓而立，或以百家共置。爾其寒食之節，禁火藏煙，鬥雞蹋鞠，佐以鞦韆。桐華始秀，榆火將然。古有司烜之禁，俗有介推之言。」¹⁰⁰ 詳細記載從元旦到寒食的習俗活動，有象徵吉祥的物品或飲食，有具辟邪作用的掛飾，有屬於百姓的民俗活動，有具有歷史意義的紀念活動，更有提供舒活筋骨的體能或娛樂活動，結合時令而累積了繁多的三春活動，共同形塑出國富人安的盛世景象。

95 同上註，頁 2631。

96 同上註，頁 2632。

97 同上註，頁 2042。

98 同上註，頁 2965-2966。

99 同上註，頁 2961。

100 同上註，頁 5219。

（二）春臺舞雩與南風厚生：時令新視界的開拓

唐代除了與禮儀有關的時令賦，著重在更精確掌握天文、物候，使物候知識與農業耕種相結合，以敬天授時達到「人和年豐」、「家給人足」、「時和俗阜」的施政理念。因時令而更細膩捕捉季節更換所映現的物候現象，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創作表現。如韋充（生卒年不詳）〈東風解凍賦〉所云「三陽布，萬物新」、「表一歲發生之候，當三春啓蟄之朝」、「是知天地既春，欣榮者衆」，¹⁰¹ 寫作視角不斷投注在春臨大地、萬物發生欣榮的景象上。王起〈蜚蟲始振賦〉捕捉春天蹤跡的方式，乃「豈惟〈月令〉舊章，紀之而無斁；〈時訓〉前典，徵之而不厭」，延續〈月令〉的書寫而更為細膩：

想像山川，依稀原隰。氣且布於感動，力無違於燥濕。秘邃泥蟠，依稀土蟄。青雲之表，期蛻蛻以龍升；繡戶之前，佇翩翩而燕入。¹⁰²

時序由冬入春，只在一夜之間，山川原隰如何感春氣而動？似乎只能用「想像」、「依稀」來形容。而王起所捕捉的物象，就映現在泥土下已蟄伏一冬的昆蟲，飽含水氣逐漸匯集的春雲，以及由南方歸來的春燕，專屬於春天的物候現象，昭示著春天的到來。貞元十九年（803）進士侯喜（生卒年不詳）〈秋燕辭巢賦〉則寫出：「漢落葉兮，火星西流。白露降兮，萬物知秋。嘉此燕之有感，將辭巢兮命儔。命儔兮焉求，應節兮周遊。」¹⁰³ 以葉落露降鋪陳出萬物對秋的感知，更集中在燕子集體遷移的大動作，以應節周遊的候鳥，映現出季節的更迭循環。

除了〈月令〉的影響，《詩經》的采蘩秉蘭，孔子的浴沂舞雩，老子的熙熙春臺，匯聚成的人文視界，映現出春天的豐美人文意涵。以闕名的〈春賦〉為例：「春日遲遲，采蘩祁祁，玩柔風兮韶景，眷芳節兮嘉時。」¹⁰⁴ 政治性的儀式與經濟性的農耕意味顯得淡薄，首二句引自《詩經》〈豳風·七月〉，而珍惜日光、辛勤農桑的農村景象，已被賞玩美好春景所取代。又以「風以解凍，魚方上冰。戴勝降桑而翔集，王雎鼓翼以嚶鳴」摹寫春臨大地的景象，

101 同上註，頁 3688-3689。

102 同上註，頁 2960。

103 同上註，頁 3666。

104 同上註，頁 5217。

從〈月令〉記載孟春的風解凍、魚上冰，到季春的戴勝降于桑，加上張衡〈歸田賦〉的「王睢鼓翼，關關嚶嚶」，¹⁰⁵大抵屬於物候知識。接著即以儒道經典映現春天的第一層人文意涵：

若夫孔門浴沂之詠，老氏登臺之樂，知盛德之在木，見平秩於東作。雨潤榆莢，雲飛白鶴，既薦鮪以乘舟，亦先雷而奮鐸。¹⁰⁶

以《論語》〈先進第十一〉曾點言志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¹⁰⁷闡釋順天時以詩意棲居的生活模式；以《老子》的「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¹⁰⁸映現出太平和樂的氣象。如此生活，即是風調雨順、物阜民豐的理想典範。春天的第二層人文意涵映現在人類賴以生存的食物與婚姻：

亦復歌〈豳〉詩，舞〈雲翹〉。后妃之種稷初獻，東宮之琴瑟方調。¹⁰⁹

以《詩經》〈豳風·七月〉的農耕生活為指標，發展出由后妃向天子獻種稷的儀式，宣示與民同作的意涵；¹¹⁰而東郊迎春的〈雲翹〉舞，¹¹¹引入〈關雎〉的琴瑟合鳴，昭示著兩性婚姻的和諧美滿。不論是百姓的勤懇素樸生活，或是迎春娛神樂舞，乃至兩性青春戀情，都已納入皇室的職掌而具有指標性意義。此外，在飲食上也以蓬餌、漿粥等易於入口的精製食品，象徵由冬入春的「進彼柔良，去其桎梏」，充分顯現春天的特質。完成了「元日祈穀，東郊迎氣，女夷鼓士，上人秉耒」的農耕階段，暮春更是一個發展人際關係的時期：

又有暮春之首，布和之辰。臨流高會，楔飲斯陳。過平陽之第，臨薄洛之津。集彼張裴，翫茲消濤。復有蕙肴輕泛，犢車見尋。周公之城洛邑，秦昭之受

105 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卷 35，頁 769。

106 簡宗梧主編，《全唐賦》，頁 5217。

107 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本），卷 11，頁 100。

108 王淮撰，〈道德經注之審查〉，收入氏著，《王弼之老學》（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2012），《道德經》第 20 章，頁 76。

109 簡宗梧主編，《全唐賦》，頁 5218。

110 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稷之種，而獻之于王。」（卷 7，頁 113）

111 劉宋·范曄，《後漢書》，〈志〉第 8〈祭祀中〉：「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祭青帝句芒。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臺北：鼎文書局，1981），頁 3181。

水心。或執蘭而容與，或暴藥以沈吟。天淵則壇名積石，華林則隄號千金。
叢花繞練以凝望，流鶯滿枝而轉音。斯并著於時令，故存之於翰林。¹¹²

暮春正是景氣清和、繁花似錦的時候，名園勝地，江邊水涯，既有王公貴介的宴會，也有文人雅士的臨流禊飲，而承襲《詩經》〈溱洧〉的士女相謔、秉蘭贈芍藥，有叢花與流鶯共同點綴出繁春的良辰美景。又如陸贄（754-805）的〈登春臺賦〉，以「春發生以煦物」開端，扣合「春無物而不滋」的時令特性，從人情上發揮「感何深兮感春」、「天何言哉生衆彙，人有靈兮感元氣」的感動，極力摹寫「觸類斯感，衆芳俱榮。風出谷以天霽，雲歸山而景晴」、「懿夫情之誘人，人罔或舍。時之感物，物莫能假。臺有春而必望，春何情而不寫。條風始至，散灼灼之紅桃；穀雨初收，潤萋萋之綠野。」春臨大地，天霽景晴，春風和暢，萬物滋長，放眼盡是灼灼桃紅、萋萋綠野，情以物興，自然是「望春而可樂」，因而深契浴沂舞雩的生命樂境：「賞同沂水，聊舞雩以詠歌」，寫出：

周望既極，含情則多。媚遲日之未下，愛清風之屢過。目眇眇以心遠，野悠悠而氣和。可以樂芳時之景物，壯皇室之山河。¹¹³

春光美景所引發的人情，包括媚遲日、愛清風、心遠與氣和，都是正向而纏綿的情意。因而提出「豈比夫羈士登樓而作賦，碩人在軸而爲歌者哉」的反思，不同於王粲〈登樓賦〉的思歸、《詩經》〈考槃〉的碩人幽居，陸贄筆下的春天，是呼應時令物候而洋溢著和樂欣悅之情。再以元和進士李景讓（787-858）〈望春宮賦〉爲例，不同於唐以前宮殿賦著重在建築群的富麗堂皇與威嚴體制，寫宮殿亦只「層宮嶙峋」、「標上苑而獨出」、「偉鳳闕之樓臺」等聊聊數句，極力摹寫君王嚮往宮殿外的原野之春：

吾君於是縱目前檻，馳神遠郊。散晴煙於地表，拂佳氣於林梢。睹青陽之煦然，載懷祈穀；聽倉庚之鳴矣，不使覆巢。布政有孚，宸遊是假。察微明於遠嶠，睇新綠於平野。南山之翠色盈前，渭水之素光在下……況乎流鶯欲轉，初柳生姿。懿祥風之習習，增麗日之遲遲。¹¹⁴

112 簡宗梧主編，《全唐賦》，頁 5219-5220。

113 同上註，頁 1998-1999。

114 同上註，頁 3959-3960。

李景讓爲身居宮中而神馳遠郊的帝王，勾勒出春日煦暖、景氣晴明的春景，習習和風，遲遲春陽，盈盈渭水，提供了長養萬物的生機，從遠嶠、南山、平野到柳樹，大地一片欣欣綠意，再有倉庚、流鶯等春禽的好聲相應，而種種春光美景的鋪陳，都在導引出「祈穀」、「賦籍田」與「五稼惟時」的美政。特別是貞元五年的科舉考試，取〈南風〉之歌的解民慍、阜民財，¹¹⁵以〈南風之薰賦〉爲題，留下張正元、吳仲舒、李夷亮三位進士的答案卷，對舜歌南風雖各有詮釋，大抵不出時令與養民兩大端，列如下表：

作 者	時 令	養 民
張正元	感萬物之如春……順而隨時……氣之相感。	成天下之務，畜天下之財……國家以義為利……內協正德，外何厚生……詠時康與俗阜。 ¹¹⁶
吳仲舒	薰風自南兮，萬物咸遂……動萌芽……榮林藪……早綻青門之柳，先驚上苑之梅。	薰風之有德也，使國富以人安；薰風之有惠也，使時和而俗阜。 ¹¹⁷
李夷亮	時之和兮道之至，彼南風兮舒以肆。發於地鼓萬物以生成……熙熙然見群芳之已遂。	國家敬授惟明，稽古作程。式宣其和，以厚實生……惟德斯碩，惟財孔阜。 ¹¹⁸

傳統農業社會所以能夠傳之久遠，乃在於結合時令與養民的施政理念，感受到萬物生發的春意，春夏之間的辛勤耕耘與播種，關係到歲收的豐歉。就執政者而言，這一段時間特別能感受到以民爲本、以農立國的觀念，把所有的祈願、所有的善意，都給了勤奮的農民，以確保國家的富足安康，而國富、時康、時和、蓄財、厚生、俗阜、財阜、人安，也就成了一再出現的高詞頻群。吳仲舒更以君王長養與煦嫗萬物並舉，雙拈韶年麗景與順時豐財，使明媚春光具有豐財富國的意涵。相較於漢魏以來的貴游雅士，因纏綿於良辰美景、賞心樂事，而發展出尋春、憐春、惜春、留春、歎春、傷春等文人症候群，唐人因應科舉取士的時令賦，乃能回歸「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的自然

115 詳見王肅編撰，《孔子家語》，頁 41。

116 簡宗梧主編，《全唐賦》，頁 2325。

117 同上註，頁 2469。

118 同上註，頁 2475。

法則，以及「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的治世理念，¹¹⁹ 形構一個合韶年麗景與順時豐財而雙美的生存境地。

（三）中和節詩賦所強化的仲春意象與國家論述

德宗（779-805）貞元五年除了以〈南風之薰賦〉為科舉考試題目，同一年廢正月晦，改二月一日為中和節，對時令的高度關切，與氣候異常現象有密切關係。依前引《新唐書》〈五行志〉的貞元元年正月大風雪、貞元二年正月大雨雪等記載，時序已是春天，平地還降下數尺雪，詩人面對冬天向春天延伸的現象，即有「時令自逆行」、「時令一反常」、「寒燠苟反常」之感歎。¹²⁰ 政治上的作為，除了例行性的時令儀式以祈求時順民阜之外，強化春天的節慶意義，以君民同樂的氛圍，形塑天人共向繁榮的太平景象。唐代時令「清明」已與寒食、上巳結合而有節慶化的傾向，詩人吟詠多在踏青、鞦韆、蹴鞠、拔河、風箏等休閒性活動，¹²¹ 德宗欲以二月名節，李泌（722-789）乃奏立中和節，並導向以農業活動為主，《新唐書》〈李泌傳〉云：

帝以「前世上巳、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與上巳同時，欲以二月名節，自我為古，若何而可？」泌謂：「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為中和節，因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瓜果種相問遺，號為獻生子。里閭釀宜春酒，以祭勾芒神，祈豐年。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¹²²

「晦」為月盡，字義偏於昏暗、澀滯，李善注江淹〈王徵君微養疾〉詩「寂歷百草晦」云：「凡草木華實榮茂謂之明，枝葉凋傷謂之晦。」¹²³ 迥異於春天

119 前者出自《論語注疏》〈陽貨第十七〉，頁 157；後者出自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大禹謨〉，頁 53。

120 此見於元和六年（806）的二月雪，孟郊〈貧女詞寄從叔先輩簡〉的「蠶女非不勤，今年獨無春。二月冰雪深，死盡萬木身。時令自逆行，造化豈不仁。」（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 372，頁 4181）盧仝〈苦雪寄退之〉的「天王二月行時令，白銀作雪漫天涯。山人門前遍受賜，平地一尺白玉沙。」（卷 389，頁 4388）白居易〈春雪〉的「上天有時令，四序平分別。寒燠苟反常，物生皆夭闕。」（卷 424，頁 4662）〈贈友五首〉的「時令一反常，生靈受其病。」（卷 434，頁 4801）

121 如王維〈寒食城東即事〉乃寫出「蹴鞠屢過飛鳥上，鞦韆競出垂楊裏。少年分日作遨遊，不用清明兼上巳。」（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 125，頁 1259）

122 歐陽脩、宋祁，《新唐書》，卷 139〈李泌傳〉，頁 4637。

123 梁·蕭統編撰，唐·李善注，《昭明文選》，卷 31，頁 449。

草木榮茂的清明景象，因而建議取「月一日始蘇」的意涵，以二月朔為中和節，設計由朝廷贈送盛百穀瓜果種的青囊給百姓的活動，象徵獻生的意義，並由百官進獻農書，宣示國家授時富民的經濟政策。德宗〈改二月一日為中和節詔〉云：

四序嘉辰，歷代增置，漢崇上巳，晉紀重陽。或說禳除，雖因舊俗，與眾共樂，咸合當時。朕以春方發生，候及仲月，勾萌畢達，天地和同，俾其昭蘇，宜助暢茂。自今宜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以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數。內外官司休假一日。¹²⁴

歷代配合時令所倡導的節令活動，各有其設置意義，如漢代的三月三日上巳，依《後漢書》〈禮儀志上〉記載：「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為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¹²⁵ 著重在春盛之際以春水祓除不潔的意義。至於九月九日重陽，曹丕（187-226）〈九日與鍾繇書〉已有「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之說，¹²⁶ 晉代更延續舊俗而留下孟嘉龍山會的落帽風流故事。¹²⁷ 德宗乃著力於發明時令進入仲春的「勾萌畢達，天地和同」，以國定假日舉行全國性的節慶活動，用意在助成動植物的昭蘇與暢茂。依此所增置的中和節，在臨水禳除、登高宴飲的上巳與重陽故事之外，增添了順時耕種的經濟意涵，合此而成「三令節」。德宗除了自製「中和節舞」，¹²⁸ 有〈中和樂舞詞〉，首揭「芳歲肇佳節，物華當仲春」，而以「庶協南風薰」自許，期能如舜歌〈南風〉的解民慍、阜民財。其〈中和節日宴百僚賜詩〉云：

韶年啟仲序，初吉諧良辰。肇茲中和節，式慶天地春。歡酣朝野同，生德

124 後晉·劉昫，《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5），卷 13，頁 367。

125 范曄，《後漢書》，〈志〉第 4 〈禮儀志上〉，頁 3110。

126 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卷 7 〈全三國文〉，頁 1088。

127 唐·房玄齡，《晉書》〈孟嘉傳〉：「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僚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臺北：鼎文書局，1983），卷 98，頁 2581。

128 宋·王溥，《唐會要》云：「貞元十四年，德宗以中和節，自製中和舞，舞中成八卦，又敘其舞曰：朕以中春之首紀為令節，象中和之容，作中和之舞。」（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 33，頁 618。

區宇均。雲開灑膏露，草疏芳河津。歲華今載陽，東作方肆勤。慚非熏風唱，曷用慰吾人。¹²⁹

充分表揚仲春的氣候清和、春雨潤澤，是一個適合生長萬物的季節，呼應農民的適時勤勞耕作，心中浮現的是舜歌〈南風〉的仁君胸懷。德宗另有〈中和節賜百官燕集因示所懷〉、〈中和節賜群臣宴賦七韻〉等詩，在君臣宴集之際，一再宣示「保和茲息人」、「與物長爲春」、「中和紀月令，方與天地長」的帝王春思。李泌〈奉和聖製中和節曲江宴百僚〉的「風俗有時變，中和節惟新」、「品物感知春」，¹³⁰ 權德輿（759-818）〈奉和聖製中和節賜百官宴集因示所懷〉的「曉開萸萸初，景麗百鳥春」、「物情舒在陽，時令弘至仁」，¹³¹ 在君臣唱和中，把仲春的時令意義推闡到極致。呂渭（735-800）〈皇帝移晦日爲中和節〉明白指出中和節在「正時」上的重要意義，云：

皇心不向晦，改節號中和。淑氣同風景，嘉名別詠歌。湔裙移舊俗，賜尺下新科。歷象千年正，醞釀四海多。花隨春令發，鴻度歲陽過。天地齊休慶，歡聲欲盪波。¹³²

闡釋改節的意義，在於「歷象千年正，醞釀四海多」，正時的作為，在於精確掌握仲春之始的淑氣風景，百花隨春而綻放，鴻雁逐陽而北返，舉國以歡欣慶典與此春令相互激盪，自然能達到授時養人的太平治世。梁肅（753-793）在〈中和節奉陪杜尚書宴集序〉亦指出：

沛乎！聖人在穆清之中，合四序，茂萬物，謂二月之吉，殷天人之和，肇以是日爲中和節。原夫「中」以立天下之本，「和」以通天下之志，明君所以總萬邦也。奉時以協氣，播氣以授人，元侯所以承王命也。¹³³

梁肅從「中」、「和」的字義，闡明一國之君「總萬邦」的關鍵就在合四序、茂萬物，而國之重臣的職責就在奉時協氣、播氣授人。貞元八年（792）的博學宏詞科即以「中和節詔賜公卿尺」爲題，錄取了裴度（765-839）、李觀（766-794）、陸復禮（生卒年不詳）三人，留下了三首應試詩。君王賜尺，

129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4，頁44。

130 同上註，卷109，頁1127。

131 同上註，卷320，頁3604。

132 同上註，卷307，頁3488。

133 董誥等編，《全唐文》，卷518，頁2330。

始見於玄宗時，如張九齡〈謝賜尺詩狀〉云：「尺者紀度之數，宣麗天文；詩者律呂之和，是生節物」，乃因物寓言，有麗天文、生節物而「取配鈞衡」之義。¹³⁴ 三首應試詩大抵從此申述，如陸復禮的「春仲令初吉，歡娛樂大中」、「從茲度天地，與國慶無窮」，¹³⁵ 裴度的「陽和行慶賜，尺度及群公」，¹³⁶ 李觀的「豈止尋常用，將傳度量同」，¹³⁷ 把君臣同樂春景的歡慶，連結到施政的全國一致性。

隨著氣候異常現象的加遽，¹³⁸ 傳統配合時令的農耕知識，已不合時用，老農老圃的實務經驗，就顯得彌足珍貴。貞元十九年（803）科舉考試即以〈中和節百辟獻農書賦〉為題，現存有胡直鈞（生卒年不詳）、侯喜、賈餗、鄭式方（生卒年不詳）等作品，著力發明中和節的春耕意涵，如胡直鈞以「農為務本，春則歲華」發端，次以「知稼穡之道，則〈無逸〉之書何遠；睹播植之論，審后稷之訓不遐。」¹³⁹ 陳述農業知識的重要，接著更以「斯載耕之自此，佇多稔之於彼。稽汜氏之法，未足方之；考〈周官〉之規，諒當改是。」闡明民間在農耕的實務經驗中，已累積了更能因應時地的豐富農業知識，故以「令節適時，良圖合盛」作結，¹⁴⁰ 映現出君民一致的努力方向。侯喜同樣以「凍已全解，桃仍欲華」、「播植之始，教化爰貞於四遐」發端，次以「陽和溥暢，言拜賜於生成；稼穡艱難，乃載陳于睿哲」闡明農業知識的專業性，並引「敬授人時，而〈堯典〉垂記；大無禾麥，則魯史頻書」之古訓，頌今王「惟人是憂，惟農是恤」之德政，¹⁴¹ 側重在君王的施政理念。鄭式方則反覆陳述農書的重要性：「思播植以富人，故農書是進；建中和而煦物，俾淳風不遐」、「授其時用天之道，進其書知人則哲」、「命陳書而王化可闡，俾知方而農政斯列」、「陳乎五種之用，本乎三農之

134 同上註，卷 289，頁 1298。

135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 319，頁 3598-3599。

136 同上註，卷 335，頁 3759。

137 同上註，卷 319，頁 3597。

138 歐陽脩、宋祁，《新唐書》〈五行志〉記載貞元十七年（801）：「二月丁酉，雨雹；己亥，霜；戊申，夜，震霆，雨雹；庚戌，大雨雪而雹。」（卷 36，頁 945）

139 簡宗梧主編，《全唐賦》，頁 2611。

140 同上註，頁 2612。

141 同上註，頁 3667。

書」，¹⁴²把足食多稌歸功於農書的作用。其中以賈餗對農書有較多的著墨：

聖上……偉三農之可嘉。因月令之初，爰詢播植；俾年豐之慶，無隔幽遐……爰修耒耜之務，用廣異同之說……捧書而進，知地利之可分；足食是圖，見天心之載悅……得富國以如此，契生人於厥初。稽重穀之言，徒稱董仲；驗深耕之法，何愧朱虛。所以候驚蟄之辰，應夾鍾之律。昭八政之所用，蓄九年之罔失。是薦是蓂，將致乎千斯倉；爰始爰謀，必因乎四之日。故當載陽之候，以進為邦之術。俾農識不耕之凶，歲獲終畝之吉。且中也者，表天地之交泰；和也者，象德化之優柔。致中和之令節，展稼穡之允修。將明肥磽異等，豐歉殊收。人靡在阿之歎，野傳擊壤之謳。¹⁴³

為了確保全國性的豐收足食，除了例行的勸農，特別注意到農業知識的加強，包括分析肥磽等耕地差異性，重穀、深耕等農耕技術的改良，援用《詩經》農業詩名篇〈小雅·甫田〉與〈豳風·七月〉的典故，闡明「中和」的時令與節慶意義，以達到富國生人、野謳擊壤的施政目標，同時也大幅拉近朝廷與民間的距離。晚唐韓鄂「編閱農書，搜羅雜訣」而撰成《四時纂要》，以〈序〉揭示：

夫有國者，莫不以農為本；家者，莫不以食為本。舜禹胙胙，神農憔悴，后稷播植百穀，帝堯恭受四時，是以德邁百王、澤流萬世者也。¹⁴⁴

國與家的根本都建立在農業生產上，乃「加以占八節之風雲，卜五穀之貴賤，手拭必成之醯醢，家傳立效之方書」、「雖慚老農老圃，但冀傳子傳孫」，把國家「正時」、「授人以時」的權力與知識，與老農老圃的實作經驗相結合，普及化而成為實用的家庭用書。全書共五卷，春令占了二卷，在四季中特別強化與春天有關的物候知識，兼顧南、北方農業生產的差異，增加前代農書所無的農業技術，¹⁴⁵可視為德宗立中和節、百官獻農書的具體成果。

四、結 語

現存年代可考的時令賦，最早著眼於農作物生長的是唐高宗朝許敬宗〈麥

142 同上註，頁 3671-3672。

143 同上註，頁 3649-3650。

144 唐·韓鄂撰，繆啟愉校釋，《四時纂要校釋》，頁 1。

145 同上註。

秋賦應詔》，最早的試賦是玄宗朝的〈仲冬時令賦〉，最興盛的是德宗貞元年間〈先王正時令賦〉、〈東郊迎春賦〉、〈中和節百辟獻農書賦〉、〈南風之薰賦〉、〈南至郊壇有司書雲物賦〉、〈西郊迎秋賦〉等，此外即是晚唐文宗、懿宗兩朝各有一題。這樣的現象，除了可反映出中唐的氣候異常現象，亦可見唐代科舉的詩賦取士，在試賦中以崇尚典謨與切合時用為命題與書寫方針，以避「浮薄」之譏。尤以時令賦重新找回對「天文」的感知，在陰陽寒暑與四季變換中體現生存處境，連結「時」與「食」而攸關國富人安的農業生產，展現對自然的謙卑與禮敬。除了總論四時的〈先王正時令賦〉、〈聖人以四時為柄賦〉，四季時令的不同書寫，以春季的關注面向最為豐富，有東郊迎春、立春出土牛、東風解凍、蟄蟲始振、木向榮、登春臺、讀春令、獻農書等；夏季乃聚焦在南風、雲物，秋季有西郊迎秋、麥秋、秋燕辭巢，冬季有北郊迎冬、開冰等。四季時令所凸顯的書寫意義，在耕種與收成的春、秋兩季，由天子親自舉行國家級的祭祀儀式，宣示敬天授人的施政方針，精確地掌握天文、物候，使物候知識與農業耕種相結合，以敬天授時達到「人和年豐」、「家給人足」、「時和俗阜」的施政理念。特別是仲春中和節的增置，在上巳與重陽的臨水禳除、登高宴飲等節慶故事之外，增添了順時耕種的經濟意涵，以君王長養與煦嫗萬物並舉，形構一個合韶年麗景與順時豐財而雙美的生存境地。

由於時令詩賦關涉到季節更換的物候現象，《禮記》〈月令〉與漢魏以來的農書乃獲得了高度的重視，融攝了長期觀察太陽運行、四時變化與萬物消長的豐富物候知識。更因為著眼在農業的良好收成，因而能關注到某些區域性的節氣特性，播植特殊物種，也注意到鶯鳥與蜜蜂的傳播花粉，連帶到中和節獻農書所匯集的民間經驗，促成了晚唐農書的重要成果。至於春天所開啓「物候惟新」的生機，寫作視角不斷投注在春臨大地、萬物欣榮的景象上，地方官員執行春令宣導活動時，體會到地方施政就在不擾民的「無事」，乃有結合物候與勸農而時見抒情、賦物之作，而士人經世濟民的理想，遂得與友方外、賞湖山的詩意生活相結合。而春光美景所引發的人情，更結合儒道經典的春臺舞雩與南風厚生，映現春天的豐富人文意涵。可以這麼說，因應科舉的唐代時令詩賦，乃融合實用、知識與審美而為一，而為深具可讀性的應用文，最能見出人文的影響力。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司馬遷，《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83。
- 漢·汜勝之撰，石聲漢釋，《汜勝之書今釋》，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
- 漢·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3。
- 漢·劉向，《說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 魏·王肅編撰，《孔子家語》，《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 晉·陶潛撰，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臺北：里仁書局，1980。
- 劉宋·范曄，《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
- 梁·劉勰撰，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84。
- 梁·蕭統編撰，唐·李善注，《昭明文選》，臺北：文化圖書公司，1969。
- 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
- 唐·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
- 唐·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
- 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
- 唐·吳兢，《貞觀政要》，臺北：宏業書局，1980。
- 唐·唐玄宗撰，李林甫等注，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
- 唐·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
- 唐·房玄齡，《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83。
- 唐·楊倞注，清·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臺北：世界書局，1971。
- 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
- 唐·韓鄂撰，繆啟愉校釋，《四時纂要校釋》，北京：農業出版社，1981。
- 後晉·劉昫，《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5。
- 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
- 宋·孫奭疏，《孟子注疏》，《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
- 宋·王溥，《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90。
- 宋·王欽撰，周勛初校證，《唐語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宋·歐陽脩、宋祁，《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5。
- 宋·宋敏求，《唐大詔令集》，上海：學林出版社，1992。
- 清·李調元，《賦話》，臺北：廣文書局，1971。
- 清·徐松撰，孟二冬補證，《登科記考補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
-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9。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

二、近人論著

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ctext.org/>。

王士禛 2012 《唐代試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冠輯 2006 《賦話廣聚》，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王淮撰 2012 《王弼之老學》，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

吳儀鳳 2012 《賦寫帝國——唐賦創作的文化情境與書寫意涵》，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

馬積高 1998 《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曹淑娟 1987 《漢賦之寫物言志傳統》，臺北：文津出版社。

陳尚君輯校 1992 《全唐詩補編》，北京：中華書局。

逢欽立輯校 1983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

詹杭倫 2010 《中國文學審美命題研究》，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廖美玉 2013 〈韓白對中唐寒燠異常的感知與書寫〉，《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50.5(2013.9): 6-14。《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12(2013.12): 87-96，全文轉載。

廖蔚卿 1997 〈論中國古典文學的兩大主題——從登樓賦與蕪城賦探討遠望當歸與登樓懷古〉，《漢魏六朝文學論集》，臺北：大安出版社。

趙俊波 2006 《中晚唐賦分體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趙俊波 2011 〈唐代試賦的命題研究——以試賦題目與九經的關係為中心〉，《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8.1(2011.1): 127-131。

鄭毓瑜 2000 〈歸反的回音——地理論述與家國想像〉，《性別與家國——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臺北：里仁書局。

鄭毓瑜 2004 〈身體時氣感與漢魏「抒情」詩——漢魏文學與楚辭、月令的關係〉，《漢學研究》22.2(2004.12): 1-34。

簡宗梧 1980 《漢賦源流與價值之商榷》，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簡宗梧 2002 〈六朝世變與貴遊賦的衍變〉，李豐楙主編，《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文學、文化與世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簡宗梧主編 2011 《全唐賦》，臺北：里仁書局。

簡宗梧、游適宏 2000 〈律賦在唐代「典律化」之考察〉，《逢甲人文社會學報》1(2000.11): 1-16。

Seasonal Governance and Descriptions of Nature: Perceptions of Seasonal Phenomena and National Discourse in Tang Dynasty *Fu*

Liao Mei-yu*

Abstract

Our world changes with the seasons. In ancient China, several classics state that govern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eason should be the first priority in national affairs. The Han dynasty scholar-official Liu Xiang 劉向 regarded the ability to govern in this way as one of the main criteria for selecting high level officials. By the Tang dynasty,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was used to select such officials. Candidates were required to compose *shi* 詩 and *fu* 賦, and often composed *fu* on themes relating to the seasons. This study interprets two aspects of these literary works: seasonal governance (正時) and descriptions of natural phenomena (賦物). Seasonally-themed *fu* elucidate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ruler and people. Rulers declared it their objective to respect Heaven and gover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easons, and so official candidates continued to discuss and compose writings on this subject. The main themes of *shi* and *fu* written in examinations became the right path in governance and how best to benefit the people. Thus, the characteristic concern of these literary works shifted from the palace to the people. Stylistically, they also became less lyrical and more practical. Above all, the expectation was to create a more practical politics, a wealthier country, and a

* Liao Mei-yu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Feng Chia University, Taichung.

safer society. In this way these *fu* uniquely stand out from traditional Han *fu* and lyricism.

Keywords: Seasonal *fu*, seasonal governance, economy, seasonal phenomena, nation